



投稿邮箱: xzhtwxds@163.com

扫码关注“徐州放鹤亭”微信公众号



雪落杉林
摄于云龙湖畔水杉林
通讯员 张景文 摄

新年雪事

◎王卫东

2026年1月19日,大寒的前一天。窗玻璃上的雾气,是我那天早晨画下的第一个圆圈。透过这朦胧的圆望出去,沛县正在落它今冬的第二场雪。

雪下得认真了。不像去年12月那场,羞答答的,还没落地就化成了水汽,像句没说出口的话。今天的雪是有分量的,一片叠着一片,慢慢地把青石板的纹路抚平,给枯枝镶上毛茸茸的边。远处的屋顶开始泛白,一层,又一层,像是时光在给这座小城写信,每个字都写得工工整整。

手机“叮”的一声。是教育局的通知:因为低温雨雪冰冻天气,所有学校停课两天。很短的消息,我却读了两遍。心里有什么东西轻轻地落下了,那是悬着的石头,是无数个清晨在校门口张望的眼睛,是怕孩子在结冰路上摔跤的心。这份体贴来得及时,像冬天里递过来的一杯热水,暖的是握杯子的手,更是那颗提着的心。

这让我想起新疆,我的故乡。这时候的新疆,该是零下二十多摄氏度了吧。雪是常客,一下就是厚厚的,能把门框埋掉一半。我们那放假也早,不到1月10日,学校就空了。那是天地定下的规矩,冬天太长,长得必须给出一整段休憩的时间。而沛县的冬天是另一种脾气,它不常来,来了就带着特有的犷劲。所以这次的停课,不像新疆那样是冬天的仪式,倒是大人看见孩子要摔跤,提前伸出的那只手。

离过年不到一个月了。前一天,我去市场,买了六个猪蹄子、三公斤牛肉、六个猪耳朵。肉摊的老板娘系着沾满油星的围裙,一边剁骨头一边问:“今年在沛县过年?”我点点头。她又多送我两根大骨:“熬汤,这天喝了好。”肉很沉,拎在手里坠坠的,可心里是满的,满得要溢出来的,是快要过年的踏实。

现在这些肉就在煤气灶上咕嘟着。我学着从前父亲肉肉的样子,放了老抽、花椒、生姜、八角、桂皮、草果、白芷、香叶、山楂。水汽蒸腾起来,厨房的玻璃又蒙上了雾。这场景多熟悉啊,好像父亲又守在旁边,不时用筷子戳戳肉块。他说:“肉肉急不得,要小火,要等。”等什么?等时光把滋味一点点焐进去,等离家的人循着香味回来。现在等人的人变成了我,在异乡的灶台前,复刻着记忆里的温度。

下午,肉肉的香气已经飘满屋子的时候,我拎着桶下楼去打矿泉水。雪还在下,不紧不慢的。我的泰迪“七喜”早就等不及了,门一开就窜出去了,在雪地上连打了三个滚。它是从新疆带来的狗,在石河子市的时候,最爱在雪堆里扑腾。来沛县这大半年,冬天总是干冷干冷的,雪下得少,下也存不住。今天总算让它逮着了。

“七喜”的老朋友们也都来了。几个小家伙碰在一起,先是你闻闻我,我闻闻你,然后突然就闹开了。它们的主人站在不远处,搓着手,呵着白气,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:“这雪下得真好。”“是啊,孩子们可高兴了。”

我们是真的高兴。不远处的空地上,几个孩子拉着简易的滑雪板,其实就是塑料布或者硬纸板。笑声像铃铛,叮叮当当的,被风送过来。有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摔倒了,没哭,反而咯咯地笑,爬起来拍拍身上的雪,又追上去。他们的脸红扑扑的,眼睛亮晶晶的,那快乐简单得让人心疼,心疼我们这些大人,怎么就再也回不到那样容易快乐的年纪了。

我再回到那里看了一会儿。雪落在肩上,悄没声的。忽然觉得心里特别安静,好像这场雪把什么都盖住了。它们盖住了烦心事,盖住了乡愁,盖住了这一年奔波落下的尘埃。世界只剩下白,干干净净的白。树是白的,车是白的,远处的房檐是白的,连时光都像被雪擦过,变得崭新崭新的。

雪是时间最温柔的谎言。它把一切不完美都覆盖成童话,让我们暂时忘记生活的沟壑与斑驳。可也正是这谎言,给了我们喘息的时间,就像那停课两天的通知,就像锅里慢慢炖着的年味,就像孩子可以在雪地里放肆大笑的这个下午。人生需要这样的谎言,需要这样明知短暂却依然全心投入的洁白时刻。

回到屋里,天已经暗了。路灯亮起来,透过窗户,能看见雪花在光柱里跳舞,慢悠悠的,不知疲倦。肉肉的火关小了,锅里还有咕嘟咕嘟的声响,像是冬天在说梦话,说的也许是故乡的炉火,也许是母亲年轻时站在灶台前的身影,也许只是一些关于温暖的、琐碎的回忆。

“七喜”趴在暖气片旁睡着了,胡子上还沾着化了一半的雪。它的小肚子均匀地起伏着,也许在梦里,它又回到了新疆深深的雪原,在那里奔跑、打滚,把整个自己埋进雪的怀抱。它不知道,那些雪和今天的雪并没有什么不同,都是水的另一种形态,都是终究要消失的洁白。可它依然快乐,依然在每个下雪天兴奋地摇尾巴。

我突然明白了什么。我们的一生,不就是在无数的“暂时”里寻找永恒么?父亲教我的肉肉方法会传下去,教育局的停课通知会变成某个孩子记忆里的暖意,“七喜”在雪地里打滚的快乐会留在它的身体记忆里,这些瞬间的温暖,这些短暂的洁白,这些明知会消失却依然全心去爱、去感受的勇气,才是对抗时间最柔软也最坚韧的力量。

窗外的雪还在下。同样的雪落在新疆,也落在沛县;同样的思念,从父亲昔日的锅里升起,也从我的锅里升起。

肉还在锅里炖着,雪还在窗外下着,这就够了。在这岁末的寒夜里,在这一场终究要化的雪中,我们炖着一锅叫作“年”的温暖,等待所有奔赴都有了归处,等待所有思念都有了形状,哪怕那形状,只是此刻窗玻璃上,一个正在慢慢消失的、雾气的圆圈。

敬安的第一辆自行车

于今人而言,自行车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代步工具,甚至渐有被电动车取代之势。若问及沛县敬安镇何时开始有自行车,恐怕多数年轻的敬安人都无从作答。

敬安人的骑行史,起点可追溯至1921年前后。民国年间,铜山县敬安镇李新集(今属丰县梁寨镇)有位名叫张德功的青年,他生于清末,青春正好时,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烽烟四起。

面对欧洲战事,民国北洋政府采取“明示中立、暗持参战”之策,推行“以工代兵,赴欧参战”——选派中国劳工加入英、法、俄为首的协约国阵营,对抗德、意、奥同盟国。彼时,徐州郊区尤其是铜山县境内,大批青壮年投身中国劳工旅。入伍后先赴山东威海集中受训,再乘船奔赴法国、英国前线。这支被协约国称为“中国劳工旅”的队伍,核心职责是为西线战场提供后勤保障。四年战乱,无数华工魂断异国,另有数万人战后滞留欧洲。战争导致欧洲男性伤亡惨重,这也让部分华工得以在英、法两国成家立业,甚至有人后续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。

张德功与一众敬安同乡,主要在法国战场服役。战后,他在法国成家生子,略通法语,过了两三年安稳日子。因是独子,父亲早逝,家中唯有老母亲相依为命。几番家书催促,张德功孝心难抑,终究还是告别妻儿,乘船归国省亲。登船时,他身着法国军服,挎枪在身,英气逼人。船抵南京,警方没收了他的枪械,令其换上便装,方才放行出站。

归乡后,母子团聚。面对乡亲们接踵而至的问询,张德功一一应答,众人方才知晓,他出国数年,不仅学会了法语、射击、手艺,还掌握了骑自行车的本领。消息传到敬安镇公所,主事者也知道这位见过大世面的能人。

一日,几人骑马飞奔而至,登门寻访张德功。乡亲们纷纷揣测恐有变故,来人笑着说明来意:敬安镇公所新买了一辆自行车,无人会骑,特来请张先生到镇上传授技艺。

张德功欣然应允,随来人策马赶往敬安镇。镇公所大院早已围满了看热闹的乡邻,

人人都好奇这两个轮子的物件,何以能直立前行而不倾倒。

张德功步入场中,稍作调试便扶起自行车,蹬脚、侧身、落座,行云流水间已然骑行起来。时而疾驰,时而缓行,一圈又一圈,车身稳如平地,远超围观者的预料。一时间,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,久久不息。

这场精彩的骑行表演过后,镇公所盛情款待了张德功,并留他在镇上教众人学骑自行车。

斗转星移,岁月流转。后来,中国成为闻名于世的“自行车王国”,自行车走进千家

也非走亲,而是跟着在敬安负责治安的邻居张文生同往——他时任敬安保安队长。

距敬安二里外,沿徐丰公路望去,便能望见镇西的两座寨门与绵长寨墙。南侧通入西大街的是大西门,往北二百米处,通入西小街的是小西门。小西门外路北,矗立着一座青石雕琢的“龟驮碑”,与高耸的寨楼遥相呼应,衬着土黄色的寨墙,定格成我此生难忘的“敬安初印象”。多年后我才知道,那座“龟驮碑”原是敬安韩家的功德碑。

那日,张文生并未直接带我们进寨,而是沿着寨西的护城河一路南行,边走边为我们

钟声,无不深受震撼。而今回望,那悠悠钟声似有魔力,穿越八十余载岁月,依旧绵长不绝,萦绕心头。

督学来了

1938年5月18日,沛县、丰县县城相继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;次日,徐州城也不幸失守。彼时,民国政府所属的县、区地方政权尚未撤往大后方,仍驻留徐州,因此徐州各县除县城及交通沿线的大集镇被日军掌控外,乡村地区仍基本处于民国地方政府管辖之下。驻徐州、丰县、沛县县城的日军,偶有下乡骚扰,亦属临时之举。这种“双重格局”,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小学教育。

抗战爆发前,我已踏入小学学堂。在日军占领的徐州一带,小学课本形成了两套体系:一套是国民政府原定课本,一套是伪政权编印课本,而日常教学仍以政府课本为主,唯有日伪军进村时,才慌忙拿出伪课本应付。

上课时,老师总反复叮嘱我们:“县政府的督学驻在敬安,随时可能来班级巡视,大家务必衣帽整洁、懂礼知仪,写字也要工整规范!”

起初听闻这话,我们都格外紧张,可日子一天天过去,督学始终未曾露面,大家便渐渐松懈了。这般状态持续了约莫一个学期。某天,突然有人骑着马来进校园,校长与老师们慌忙上前迎接,神色恭敬又惶恐——来人正是督学。

这位督学年纪尚轻,气质文静,对我们训话时,所言皆是勤奋求学、热爱祖国、以教育救国之类的话语,温和而有力量,丝毫没有威慑感,倒让我们不解老师们为何那般紧张。督学隶属于县教育局,因敬安区域广阔,特专派一人驻留,巡查区内各所学校。他孤身一人,仅一马相伴,无任何随从。

八十五年光阴流转,当年的场景仍历历在目:长路漫漫,道阻且长,一位督学单枪匹马,骑着马穿过青纱帐,踏过黄土路,遍历区内每一所学校,巡查督导,从未停歇;旧庙宇改造成的新学堂里,教书先生执鞭授课,农家子弟伏案苦读,伴着鸡鸣犬吠,间或夹杂着远处隐约的枪炮声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在乱世中坚守着求知的微光,静待成长。

敬安往事

◎口述/李鸿民 整理/田秉钊

万户,男女老少皆能骑行,成为国人出行的主要工具,街巷间一度汇成自行车的洪流。近年,随着汽车普及,自行车渐有“退场”之势,但它在国普及近百年的史实,毋庸置疑。只是敬安人未曾想过,家乡的骑行火种,竟由一位从法国归来的华工点燃。

我记忆中的敬安集

我家在李新集,地处敬安镇西北四十里、华山镇南十四里。按民国建制,此地属铜山县第四区,即敬安区;回溯明清,这一区域则为铜山县(清雍正十一年前称彭城县)第五乡,又名安乐乡,乡公所亦设于敬安集。

因这一层归属关系,民国年间,村里遇红白喜事办酒席,乡亲们总会跋涉数十里,赶往敬安集采买各类稀罕食材。彼时的敬安集货丰市旺,市井喧嚣,在村里人眼中,俨然一座“小上海”。

我第一次去往敬安,约莫十岁光景,同行的是几个年龄相仿的伙伴。我们既非赶集,

讲解。护城河不算深,有一段淤塞严重,水浅岸窄,张文生纵身一跃便到了对岸,旋即又跳了回来,身手利落。

那日里,我们几个孩子在敬安的街巷里悠然闲逛,真真切切地觉得自己置身于“大上海”的街头了。镇内格局清晰:一条南北大街贯通南门与北门,两条东西街(大街与小街)分别连接大西门、大东门与小西门、小东门。敬安寨墙为夯土所筑,墙顶设土堞,六座寨门外各配雉楼,供瞭望警戒之用。寨墙大致呈方形,周长约三公里。

街道两侧店铺鳞次栉比,涵盖酒店、烟铺、饭店、药铺、诊所、镶牙店、银匠铺、理发店、客栈、染坊、布庄、酱园、木匠铺、铁匠铺、棉花坊、油坊等,一应俱全。此外,最让我印象深刻的,是敬安集的庙宇之多与教堂之宏。两座教堂均坐落于南街,由外国传教士主持:一座天主教堂,大门朝南,内有高大的西式礼拜堂;另一座基督教堂,大门朝西,木塔之上高悬铜钟,早晚鸣响,声传三四里外。几个少年平生第一次听闻如此雄浑悠远的

发出了信号。此时,日军刚结束夜间站岗,一个个钻进温暖的被窝,连枪支都随意扔在一旁。宋培年屏住呼吸,紧握着平手里撬道钉用的铁钎,守在宿舍门外,警惕地留意着车站内外的动静,随时准备接应战士们。突击队如猛虎下山,借着列车进站的汽笛声掩护,迅速冲进日军宿舍。徐荫堂参谋一脚踹开门,驳壳枪喷出怒火,睡梦中的日军还没反应过来,就已应声倒地。有两名鬼子惊醒后妄图反抗,宋培年见状,毫不犹豫地冲上前,抡起铁钎狠狠砸向其中一人的后背,那人惨叫一声瘫倒在地;另一人转头扑来,他侧身躲开,顺势用铁钎顶住对方咽喉,

死死按住不放,直到战士们赶来将其制服。战斗全程不到10分钟,6名驻守日军被全部歼灭。可就在突击队清点战利品时,一里地外据点的20多名日军闻声增援而来。宋培年立刻指引战士们利用铁路旁地形埋伏,自己则悄悄扳动道岔,让一列空载货车停在轨道中间,阻断了日军的前进路线。当增援日军踏入埋伏圈,“缴枪不杀”的怒吼响彻雪地,大部分日军吓得丢盔弃甲,少数负隅顽抗者被当场击毙。

这场雪夜奇袭,端了日军的碾庄据点,缴获三八式步枪、掷弹筒、弹药及军用物资,更狠狠粉碎了“新四军游而不击”的谣言。

战斗结束后,宋培年隐姓埋名前往土山镇继续从事地下工作。

岁月流转,碾庄站的铁轨换了一茬又一茬,自动化道岔取代了人工扳道,但宋培年在大雪之夜的壮举,早已和铁轨融为一体,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。他用铁路工人的坚韧与勇敢,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,告诉我们:平凡的岗位上,也能绽放出最耀眼的爱国之光。

(作者系宋培年外孙,本文据老人生前讲述整理而成)

1941:碾庄站的那场雪

◎吕鸣

1941年的苏北寒冬,陇海铁路碾庄站的铁轨被冰雪覆盖,却掩盖不住暗涌的抗日怒火。扳道工宋培年穿着打补丁的工装,看似和往常一样检查道岔、擦拭信号灯,实则早已将日军据点的每一处细节刻进心里——他是新四军安插在车站的地下党员,是刺破黑暗的一把尖刀。

那时的碾庄站,是日军运输战略物资的关键节点,6名日军驻守于此,却仗着铁路线的“保护伞”肆意妄为。他们白天蜷缩在宿舍呼呼大睡,夜里才敷衍站岗,寒冬腊月里更是缩在屋里烤火炉,全然没把中国军民放在眼里。宋培年看在眼里,恨在心头,他借着扳道、检修的机会,悄悄摸清了日军的宿舍位置、武器摆放情况,甚至数清了每张床铺对应的鬼子,并将这些关键情报一一传递给新四军。

2月20日凌晨,大雪纷飞,狂风呼啸,恶劣的天气成了最好的掩护。宋培年按照约定,在扳道房门口轻轻晃动手电筒,一束微光穿透雪幕,给潜伏在路沟里的突击队



浮世杂拾